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党员、党权与党争

1924 ~ 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王奇生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王奇生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ISBN 7-80678-050-5

I. 党... II. 王... III. 中国国民党 - 组织建设 - 研究 - 1924~1949 IV. D693.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1540 号

责任编辑 郑力民

封面设计 程 钢

技术编辑 张伟群

党员、党权与党争

——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王奇生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640×935mm 1/16 印张 25 字数 360,000

2003 年 10 月第一版 2003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678-050-5/K·12

定价 42.00 元

作者简介

王奇生，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武汉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先后任职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7~199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要论著有《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人事递嬗》、《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等。

第一辑 (2003 年)

党员、党权与党争

王奇生

—— 1924 ~ 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

郑匡民

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

李细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 张海鹏

副主任委员 虞和平

委员 从翰香 刘志琴 李文海 杨天石 杨奎松
郑师渠 姜涛 徐辉琪 耿云志 陶文钊
曾业英 蒋大椿 薛衔天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总 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自 1950 年 5 月建所,已阅 53 年。建所初期曾出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发表本所同仁的研究论文,未几停刊。1954 年,中国科学院创刊历史学界的重要刊物《历史研究》,以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尹达和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分任主编、副主编,研究所学者有了发表论文的固定园地。1960 年,《历史研究》主编改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担任,编辑部也迁到近代史研究所,直至“文革”被迫停刊。1976 年,《历史研究》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仍由黎澍主编,但编辑部独立,迁出近代史研究所。1979 年,鉴于新的历史时期到来,历史研究工作全面展开,中国近代史研究前景可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了以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论文为主的学术刊物《近代史研究》杂志。这个刊物创办迄今也快满 25 年了,它在推进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为学术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和物质环境。本所学者撰著的学术论文空前增多,专门著作的发表也空前增多。尤其是 1989 年以来,所里在适当关注集体著作的前提下,提倡研究者发挥个人长处,加强专题研究。经过 10 年努力,我们在专题研究上取得了可观成绩。10 年来本所研究人员出版的各类专著超过了 170 部,大大超过了此前数十年发表专著的总和。这些专题研究,扩大了研究领域,拓宽并且加深了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推进了中国近代史领域的学科建设。这些专著,都是分别在各种不同的出

版社出版的。我们一直在设想,如何选择若干比较优秀的专著,集中在一个出版社出版,期能全面反映本所学者的研究趣向,向学术界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本所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单位,无法全面支持学术专著的出版,所以我们的条件比较苛刻,希望在不提供出版经费支持下实现集中出版学术专著。几经探索和征求,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做这样的赔本生意,事情便耽搁下来。2001年,上海书店出版社获悉我们的想法,愿意承担出版任务,这使我们喜出望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上海书店出版社随即签订了出版合同。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出版的缘起。

2002年,经过本所学术委员会讨论,选择了三本专著,决定纳入首批专刊目录,在2003年问世。这三本专著是: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郑匡民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李细珠的《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这三本正好是三位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期间的研究报告。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目的很单纯,就是向学术界推出本所学者的专门著作,交流问学,请求学术的批评,以期推动学术进步,繁荣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是每一本著作都可以列入专刊,大体需经本所学术委员会议论,方可入选。我们希望在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细水长流,每年出版二、三本,垒珠积寸、集腋成裘,以成大观。是为序。

张海鹏

2003年3月20日

于北京东厂胡同一号

序

章开沅

治史难，治当代史尤难，治当代政治史更难。当代史之所以难治，盖因所治之对象尚未“冷却”，治史者自己置身于当代社会之中，对所治之对象难以冷眼旁观，评人论事难免受到外在环境之影响与内在心境之囿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即此之谓也。

以国共两党的历史而言，受两党数十年政治竞逐和对立之浸染，置身于不同政治环境之下的海峡两岸学者对两党历史的论断即存有甚深的歧见。即令以客观严谨相矢的纯正学者亦难免残存意识形态之余绪和政治情结之遗风。如两岸学者在有关 1927 年“四一二”清党历史的书写中，一方颂之为“护党救国运动”，另一方则遣之为“反革命政变”。又如 1949 年的大陆政权易手，一方称为“沦陷”，另一方则称为“解放”。鉴此，1995 年在台北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上，我坦诚地提出了“尊重历史，超越历史”的建言。这一倡议颇引起两岸学者的共鸣。所谓“超越”，就是治史者应该置身于“山外”而非“山中”。只有置身于“山外”，才能避免被树叶障目；也只有置身于“山外”，经过俯瞰、仰视、横瞄、竖望、远眺、近观，才能逐步认识庐山的真面目。然而，这个真面目还只是外表形貌，并非它的内在结构及蕴含；要深入探究其丰富蕴含，还必须“神游其内”。所谓“神游其内”，借用陈寅恪的话，即是“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术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而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治史者要“设身处地”，把自己置身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这样才有可能获致比较

客观而又贴近历史实际的“知人论世”。

通读奇生这部书稿以后,我觉得他在“置身于外”与“神游于内”两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就前者而言,作者已经超越国共相争的历史恩怨,把国共两党作为史学的研究对象,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加以比较评析。就后者而言,作者广搜博采,并经过坚实的史实考订,对国民党自改组、“容共”、清党,至转型、蜕变、衰微的来龙去脉作了一次内在梳理,兼及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党治结构、党政关系、政治录用、派系纷争、党团抗衡乃至党员群体分析,从各个侧面把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剖析得相当透彻。即使对于我这样曾经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过 22 年而且自 1993 年以来又经常与海峡对岸各界国民党人士有所接触的老年读者,读后也非常有助于对国民党乃至这一段历史的整体获致许多新的认识。

台湾有些同行好友曾经戏说我是国民党“两次失败”的历史见证者。因为 1948 年我参加革命,亲眼看到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从大陆仓皇逃跑到台湾;而 2000 年 3 月 18 日我又正好在台北参加学术会议,亲眼目睹台湾政党轮替,国民党在大选中落败于民进党。但是,我却很少从国民党的组织结构上探寻其失败的缘由,而以往的相关评析中往往带有当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历史情结,难免夹杂主观感情因素。我觉得奇生这一代新生代学人,没有直接经历过国民党的统治与当年国共之间那种你死我活的惨烈斗争,所以比较容易在学术研究中排除主观感情因素的屏障,也因而能够在史事评析中保持更多的客观与冷静。

我常说治史应当如同“老吏断狱”。法国年鉴学派的先驱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也曾把学者理应具有的公正无私与法官相提并论。他认为两者的基本相同点都是忠于事实,不同的是,学者只限于观察事实并作出解释,而法官则必须依照法律作出裁决。学者的公正,表现为尊重“与其最偏爱的观点相悖的事实”;法官的公正,则表现为尊重证据而不管自己内心同情何方。

当然,布洛赫又反对职业错位。他并非主张历史学者以法官自居。他对传统史学的弊端曾提出过尖锐批评:“长期以来,史学家就像阎王

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意褒贬。”并且感慨颇深地说:“我们对于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所以他更看重的是“理解”:“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而另外一位法国历史学者保罗·利科也认为:“理解虽不能构成一种方法,却是方法的灵魂。”这就是说,历史研究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运用方法的终极目的则是对历史的真正理解,而不是随心所欲地作预设结论的任意解读。我也经常强调:“古人本有生命与知觉,但因时空隔绝已多,治史者必须设想自己身临其境,历经其事,思其所思,然后始能与其形成对话、沟通、理解。”本书在资料来源上,主要依据国民党自身形成的文献档案和出版物,尤其是蒋介石及其亲人物体的相关文献。作者注意体察当时国民党体制内人士的看法,同时兼顾和参考体制外各方对国民党的观察性言论。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尽量约束自己不作无史料根据的议论,叙事立论力图提供较为充分的事实依据,并把许多评判的空间留给读者。

1993年秋至1994年春,我曾在台北政治大学历史所执教半年。其间,曾听到一位同行友人说:“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起初我只想到两党同属一个社会的产物,或者是同具中华文化的传统渊源。后经言者自己点破,才知是指两者组织结构均模仿前苏联共产党而言。通观本书,可以对上述评论得到更为深切的理解。但是,本书作者并未停留于考察两者的师俄之同,而是着重探讨两者的师俄之异。作者认为:“1924年以后的国民党,除了党员人数急剧扩张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增强。虽然组织形式上师法苏俄共产党,而意识形态上排拒共产主义,结果只学到半套表面功夫。”与此相反,中共师俄所学到的则是全套功夫,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已经结合国情予以许多修正。此外,国民党重中央、轻地方,重上层、轻下层,县以下的基层组织特别涣散,甚至形同虚设;再则表面上强调国民革命、全民政党,而实际上并未也不可能代表全民利益,在城市缺乏民族资产阶级的真正支持,在农村更把广大贫苦农民群众推向革命潮流,而由于自身的日趋腐化,更引起多数知识分子与中间力量的疏离和不满。作者将1927年至1949年执政的国民党定位为“弱势独裁政党”,说它有独裁之心而乏独

裁之力,确实是比较确切而深刻的见解。

奇生曾在收藏民国档案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从事档案工作多年,对档案搜集之勤与运用之熟谙,早已为学者所深知。为本书之撰写,他征引的档案、年鉴、会议记录、工作报告有 50 种,资料汇编、日记年谱、文集、忆述资料有 90 种,还查阅大量相关报刊资料,为史事实证工作提供了丰厚的资料基础。不过,我总认为在引用 1949 年以后各级政协所征集和发表的文史资料时,必须特别注意忆述者当时的环境与心境,即由于外在的压力和主观意识的变化每有可能导致回忆时不同程度的失真,无论溢恶或溢美都会误导读者。虽然奇生在引用这些资料时业已经过仔细鉴别与核证,但个别资料似仍有进一步推敲的余地。

天寒岁暮,文债毕集,呵手作序,书不尽意。尚请作者与读者谅之。

2003 年元旦于武昌桂子山麓

序

杨天石

中国古无政党，国家大事取决于以帝王为首的贵族、官僚体系，可以称之为“帝治”。中国政党的萌芽，始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的兴中会。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它有政纲，有组织，有入会条件和手续，初步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特征。此后，同盟会在民国初年演变为国民党，后来又演变为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现代政党的特征日益发育。1924年，孙中山“以俄为师”，对中国国民党进行改组，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臻于完备。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民党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同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成为执政党，自此统治中国大陆22年。这22年中，国民党长期标榜“以党治国”。这样，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统治形式——“党治”。

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国民党史，必须研究“党治”，即中国国民党的治国主张及其在中国的实际运作。近年来出现的有关中国国民党的历史著作大都走的是这一条路子。这是必要的。但是，还必须同时研究国民党如何“治党”，即它如何发展党员、管理党员、从事党的组织建设等。这也是研究国民党史的学者不可忽视、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只有将“党治”和“治党”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们才能获致对中国国民党的全面的认识。

奇生的著作，研究1924年至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包括俄共体制的引入、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党政关系、党治结构、政治录用、派系矛盾、吸纳机制等多方面的问题。作者通过全面、严密的考察

认定，国民党是一个“弱勢的独裁政党”。这就从“治党”这一特定角度揭示出，在近代中国两大政党的角力中，国民党所以惨败的原因。学术贵创新，学术的生命也在于创新。本书所阐述的诸多问题，前人大都没有作过探索，没有多少现有成果可资参考，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因此，本书可以说是国民党历史研究中的一部拓荒之作，也可以说是一部独具特色、别开生面的原创之作。近年来，我们看惯了一些主题、章节、内容、叙述都大体相同的著作，陈陈相因，了无新意。读本书，相信读者当有耳目一新之感。

一部好的历史著作必须建立在丰富的历史资料之上，同时，它的作者又必须具有深刻的理论思维，能对所研究的对象作出清晰、严谨、科学的判断。奇生曾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多年，近年来又跑遍全国十多个省、市档案馆，广泛收集民国档案和相关的图书文献。本书所用资料很多都是作者第一次发现或第一次引用，从而为国民党史研究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同时，作者又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善于思考，并且善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全书新意迭出，对国民党的历史提出了许多在其他相关著作中很少见到的精辟观点。我研究民国史和国民党史 30 余年，读本书，仍然经常有新颖而出乎意表的感受。

世间一切事物都处于一定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质，也表现出一定的量。因此，历史要忠实地记录过程，这是它的主要任务，但是，历史也要对处于特定过程中的事物作出质和量的分析。既往的某些历史著作，或忽视对过程的叙述，或重视“定性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因此都不能正确地反映历史全貌。本书比较全面地注意到了上述三个方面，而在“定量分析”方面用力尤勤。书内附有 35 幅图表，举凡党员成分、信仰、职业、年龄、教育程度、兼职、薪俸、地域分布等方面，都有数量统计，这在其他相关著作中是很少见到的。旧中国普遍忽视对国情的调查统计，国民党对自己的“党情”也所知甚少。即使单从本书所附图表，也可见本书作者投入了怎样的辛勤劳动。

近年来，一些年轻的史学研究者很注意吸收海外史学家的优长，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甚至某个特定地区，都会有自己的独特文化，自然，历史学家们也都有自己独特的知识结构、思维

方式、话语系统。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固属十分必要，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其表现之一就是生硬地照搬境外的话语系统，以致不知所云。奇生注意吸收海外史学家的优长，从书中的考察角度、话语系统可以看出这种吸收的痕迹，但是，却决不牵强，决不生硬，融合无间，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清人黄遵宪诗云：“国方年少吾将老，青眼高歌望尔曹。”奇生年方四十，正值一个学者的起步阶段，已经如此成熟，有了如此卓异的成绩，循此前进，成就大有望焉。

2003年8月13日草于长春南湖宾馆，
8月22日定稿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自序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最显著变化,是它实现了从传统王朝政治体制向现代党治政治体制的转型。国民党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党治政权。它的建立标志着那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形态是步入了以党治国的党治时代。

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20余年。以西方议会政党而言,一党连续执政20多年甚为鲜见。但以中国传统王朝而论,执政20余年只能算是一个短命王朝。在中国,国民党的党治为什么会这么快就趋于衰竭?这几乎是所有国民党史研究者都曾思考过的问题。

自国民党执政以来,它最受贬斥和非议的要算其一党独裁的党治形式了。一党独裁也许不得人心,但未必会使国衰民敝。世界上一些政党的党治经验表明,以党治国不失为一种加强国家统治权威和稳定社会秩序的有效政治制度。据亨廷顿的研究,在“二战”以后新起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一党制较之多元政党体制能使国家更趋于稳定〔1〕。

在人们的观念中,独裁常与强权相关。实际上,独裁政党亦有强弱之分。国民党是一个老党,一个大党,但却从来不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国民党虽然具有强烈的一党独裁和政权垄断意识,但其“党力”相对于中国的国家规模而言,并不强大。其党的组织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软弱涣散的状态中,其离散而有限的“党力”在相当

〔1〕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366~402页。

程度上制约了它训政的力度。国民党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这样的党如果没有强劲的对手,也许还能勉强维持其统治,但它所面对的恰恰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内聚功能的中国共产党,故其胜负也就可想而知了。

政党史的研究对象,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党治史”,一是“治党史”。“党治史”主要指一个政党从事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的历史。对一个执政党而言,则主要表现为其控制和行使国家统治权力的历史。而“治党史”则主要是指一个政党自身组织建设、组织管理和组织形态演变的历史。应该说,无论哪一个政党的历史,均有“党治”与“治党”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只有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才是一部相对完整的党史。

鉴于既往的国民党史研究较多关注“党治史”的一面,本书特以国民党的“治党史”为重点,着重考察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政治录用体制、党政关系、派系之争与党内精英冲突、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等问题。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尝试从社会史的视角切入,将政治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将国民党史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变迁的背景中来描述,也许这会显得鲜活和丰满一些。

本书将研究对象的时限设定在1924~1949年。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国民党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模式之引入;二是“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党治”理论成为定制。1924年以后,国民党由一个区域性的执政党逐渐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执政党,直至1949年终结。在此期间,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对该时期中国政局的演变有何影响,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资料来源上,本书主要依据国民党自身形成的文献档案和出版物,以及当时国民党人自己的看法,同时兼顾和参考体制外各方对国民党的观察性言论。尽管国共之争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目前海峡两岸学者对这一段历史的看法还存在较大分歧,其中难免潜存两党意识形态之争的余绪。鉴此,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尽量约束自己不作无史料根据的议论,叙事立论力图提供较为充分的事实依据。

本书是在博士后报告的基础上修订而成。1993年我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调至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工作,次年从章开沅先生攻读博士学位,199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进行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留所工作。修业问学期间,得到导师章开沅先生和杨天石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在本书撰写和修改定稿过程中,曾业英、张海鹏、耿云志、虞和平、徐辉琪、刘志琴、汪朝光、徐思彦、杨奎松、茅海建、马敏、朱英、徐秀丽、黄春生、谢维等教授,或给予观念和学理上的启发指引,或详予审阅和指正初稿,本人获益良多,衷心铭感。近代史所博士后站和科研处的孙思源、李桂华、刘红、陈于武、寇伟等同志对笔者给予多方面的关心和支持,近代史所图书馆的各位同仁不辞辛劳为本书资料的搜集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马振骅副馆长以及郭必强兄、曹必宏兄、张克森兄为本人查档给予诸多关照,谨此一并深致谢意。

多年来,内子万菁对笔者的研究和写作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初成长的女儿对其坐冷板凳的父亲亦能予以几分同情与理解。本人得以专心问学,大概与这种“小环境”不无关联。

感谢华夏英才基金为本书提供出版资助。